

总主编 刘泽华

中国政治思想通史

隋唐卷

本卷主编 张分田 张 鸿 商爱玲

总主编 刘泽华

中国政治思想通史

隋唐卷

本卷主编 张分田 张 鸿 商爱玲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政治思想通史·隋唐卷/张分田, 张鸿, 商爱玲主编.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4. 7

ISBN 978-7-300-19397-7

I. ①中… II. ①张… ②张… ③商… III. ①政治思想史-中国-隋唐时代 IV. ①D0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142811 号

总主编 刘泽华

中国政治思想通史·隋唐卷

本卷主编 张分田 张 鸿 商爱玲

Zhongguo Zhengzhi Sixiang Tongshi · Sui-Tang Juan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010-62511242 (总编室)

010-62511770 (质管部)

010-82501766 (邮购部)

010-62514148 (门市部)

010-62515195 (发行公司)

010-62515275 (盗版举报)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 (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联兴盛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规 格 170mm×240mm 16 开本

版 次 2014 年 9 月第 1 版

印 张 35 插页 3

印 次 2014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619 000

定 价 110.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总 序

这套九卷本的《中国政治思想通史》终于出版了，关于这套书的旨趣，在综论卷中已有详尽的论述，不再重复。这里只说几句有关的题外话。

1949年以前政治思想史的著作还是比较多的，这与当时很多高等院校设有政治系以及社会热烈议论政治有极大关系。1952年院系大调整之后，随着政治系基本被取消和政治一元化的强化，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也随之被边缘化，只在哲学史、思想史中有一点点观照。据我所知，只有极少数几位还默默坚守在这个领域，且主要是近现代史，集中在中国人民大学，由何干之主持，接续了香火，功莫大焉！

作为一门学科重新启动，应该说是与20世纪80年代陆续恢复的政治学学科设置和倡导社会思想解放相伴。

就我个人来说，20世纪60年代初，初涉中国思想史时读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他在“序言”中说，“所谓‘百家言’者，盖罔不归宿于政治”，这句话对我影响很大。由此想到，研究历史不研究思想史是极大缺憾，而研究思想史不关注政治思想，则无所归。后来又读到章太炎在《国学概论》中说：“周时诸学者已好谈政治，差不多在任何书上都见他们的政治主张。……中国人多以全力着眼政治。”钱穆当时是被批判的代表人物，但他说的中国的士人以政治为宗教，对我也很有启发。

中国历史进程中政治的作用太大了，君主对所有臣民和整个资源具有最高的掌控权，王权支配社会是无可否认的事实。与之相应，政治思想必然处于社会观念的主导地位，而王权神圣则是其核心。因此不研究政治思想史就很难解析中国历史的真谛。

半个世纪以来我一直在政治思想史领域盘桓，而反思“文革”中封建主义观念登峰造极的大泛滥，又给我以“使命”感。1984年拙作《先秦政治思想史》出版了，我自认为此书突破了把政治与阶级性等同的框框，提出政治不仅有阶级性，还有社会性。全书没有给任何一位思想家戴阶级的帽子。同时还提出，中国从有文字记载以来，即是君主专制主义，先秦诸子争论的主流是实行什么样的君主专制主义，这铸就了中国传统政治观念的基础。应该说这两个主要观点对后来的政治思想史研究有相当大的影响，也引起了相当多的争论。

有两次会议对推动政治思想史研究起了明显的作用：一次是1985年在苏州大学召开的第一次“中国政治思想史学术讨论会”；另一次是1987年在吉林大学召开的第一次“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学术讨论会”。承办者都是政治学系，我作为行外人（历史系）也忝列发起者之中。

政治思想在学科上属于政治学，尽管我一直把主要精力用于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但我置身于历史学，这样就出现了学科与人身归属的矛盾。从20世纪90年代起，我一直想申请一个多卷本的项目，由于项目在政治学范围内，而我人却在历史学，历史学又没有中国政治思想史的项目，因此两次申请皆因学科畴域等问题而被否决。其实我完全有机会移身到政治学去，但我的根底在历史学，不能为项目移身，又不能更改我的研究方向，只好蹒跚地坚持走自己的路了。

说实在的，要想搞大一点儿的项目、吸纳较多的人参加，没有必要的资金支持还真的有很多难处。所以搞多卷本的中国政治思想史的设想一拖再拖，但我从来没有灰心。相信机会会有的，但我的原则是“不期而遇”。

2005年前后教育部要在文科组建创新基地，可我已临近古稀，即将退休。我是一个“好事”之徒，退休与否与做事不相干，我提议组建一个以“思想与社会”为名的基地，此意得到南开大学学校领导、历史学院和文科各系的支持。说来也巧，竟然被批准了。我有幸被诸位老弟推举为首席专家，于是组织撰写多卷本的中国政治思想史的机会真的来了，可以说是又一次“不期而遇”。

我虽任总主编，起了一点儿发起和组织的作用，也举行过多次研讨会，但参加者都是长期从事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与教学的专家，其中多位是博士生导师，对如何撰写由他们自行其是。我所做的主要是催促进度。由于他们都是忙人，催促的效用也有限，直到2012年才把稿子集齐。

我们一群人与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各位同仁有过愉快的合作经历，这里仍需深深感谢他们再一次的鼎力支持和理解！从扶持学科发展来说，他们承继了何干之的精神！

刘泽华谨记
2013年岁末

目 录

导言 政治思想现象的弥散性与政治思想载体的多样性

第一章 经学的统一与统治思想哲学基础的转型

- 第一节 经学实现统一的主要历史动因 20
- 第二节 孔颖达与《五经正义》 32
- 第三节 自然本体和伦理本位相结合的道论与治道 46
- 第四节 孔颖达与《五经正义》的历史地位 60

第二章 钦定儒家经典注疏论君主制度的一般规定性

- 第一节 国家宪章化的钦定儒家经典 69
- 第二节 “立君为民”的国家政治本体论 81
- 第三节 最高权力一元化的政体论 95
- 第四节 阐释最高权位传承法则的天赋君权论 109

第三章 钦定儒家经典注疏论君主政治的施政法则

- 第一节 阴阳论与君臣关系的基本特征 125
- 第二节 中庸论与礼仁政治的基本法则 151
- 第三节 刚柔论与宽猛相济、德刑相须、礼乐协调的施政方略 160

第四章 钦定儒家经典注疏论人性、王政与政治教育

- 第一节 人为贵与王政 175

第二节 教化为王政之本·····	186
第三节 “六经之道”与培养统治者的政治教育理论·····	193

第五章 著名儒家思想家的政治思想

第一节 王通论“中道”及“三教可一”·····	209
第二节 柳宗元论大中之道及政治本原与国家政体·····	220
第三节 韩愈论道统与尊君·····	232
第四节 李翱论“性善情恶，灭情复性”·····	242

第六章 道教（道家）的政治思想

第一节 道教（道家）与唐代官方学说·····	248
第二节 钦定道家（道教）经典的地位与影响·····	257
第三节 著名道教学者崇道尊君的政治思想·····	264
第四节 道教经戒对信教群体政治观念的影响·····	273

第七章 佛教及其他外来宗教对政治观念的影响

第一节 佛教的中国化·····	281
第二节 佛教对政治文化的影响·····	289
第三节 弥勒大乘教的政治观念·····	295
第四节 袄教、景教、摩尼教对社会政治观念的影响·····	301

第八章 最高统治者的君道理论（上）

第一节 隋唐五代皇帝的自我政治意识·····	308
第二节 隋文帝论“有命不恒，所辅惟德”·····	318
第三节 隋炀帝论“非天下以奉一人，乃一人以主天下”·····	328

第九章 最高统治者的君道理论（中）

第一节 唐太宗论“君依于国，国依于民”·····	337
第二节 唐太宗论“恐人不言，导之使谏”·····	349
第三节 唐太宗论“以法理天下”·····	361

第十章 最高统治者的君道理论（下）

第一节 武则天论“非群臣同体，则不能兴其业”·····	372
-----------------------------	-----

第二节	唐玄宗论“以孝理天下”	389
第三节	五代十国君臣议政中的民本思想	402
第四节	隋唐五代皇帝论“百姓有过，在予一人”	406

第十一章 热点政治课题及相关的政策之争

第一节	“封建”与“郡县”两种国家结构形式之争	426
第二节	三教之争与宗教政策之争	446

第十二章 与国家财政问题相关的政治思想

第一节	隋朝土地赋役制度的制度理念	461
第二节	唐朝前期的土地赋役制度及财税理念转化的端倪	465
第三节	与财政改革密切相关的政治思想	473

第十三章 形形色色的政治批判思想

第一节	皇帝、官吏、庶民三大政治等级的政治批判思想	502
第二节	普通民众以“均平”为理据的政治批判思想	509
第三节	皮日休批判暴君弊政的仁政论	518
第四节	无能子否定圣人、君王和纲常的无君论	522
第五节	罗隐批判暴君弊政的明君论	531
第六节	谭峭非议现实的均食尚俭论	537

引用文献版本目录	543
----------------	-----

后记	549
----------	-----

导 言

政治思想现象的弥散性与 政治思想载体的多样性

中国古代政治文明是在隋唐时期步入巅峰状态的。这种状态的形成与保持有赖于丰富多彩、充满活力、富于理性的政治精神。然而，在广义的“思想史”著述中，涉及隋唐政治思想的内容可以用“贫乏”、“浅陋”来形容。就总体规模而言，就连专门化的隋唐政治思想史研究也难免“贫乏”、“浅陋”之讥。这就是说，隋唐政治思想原本相当可观，而现有研究却未能充分揭示。为什么会出现上述现象？这很值得反思。

笔者翻检过许多与“政治思想”相关的学术著作，从中发现一个令人震惊的现象，即众多有广泛影响的中国思想史著作存在系列性的重大事实误判，一些陈陈相因、积非成是的说法与“政治思想”直接相关。导致这种现象的原因很多。其中之一便是在众多因素交互作用下，学术视野受到遮蔽，取材范围受到限制。

关于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对象，前人多有学术性的界定，可谓见仁见智。笔者认为，凡是历史上出现过的与政治密切相关的各种思想现象，都是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对象。“政治”、“思想”、“历史”是界定政治思想史研究领域的三个关键词，对这三个关键词的理解直接关系到问题意识的形成、研究对象的设定和取材范围的选择，进而影响视野的广度和分析的深度。

一、“思想”与思想现象的弥散性

“政治思想史研究”是思想现象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思想史之“思想”是一个歧义众多的概念。思想史的研究对象是什么？只要看一看中外学者提出的形形色色的定义，就不难理解这原本就没有统一的定义，也不可能产生获得公认严格定义。每一种对“思想”的理解都会给出不同的领域范围和研究

视角。

思想是人类特有的禀赋，它属于一种认识性的精神活动。在汉语中，“思想”一词用于指称思忖、思虑、思索、思考、思维、思辨等，涵盖这类精神活动的过程及结果。在这个意义上，思想是一切认识活动的过程及其结果的总称。

依据认识程度，思想的成果可以划分为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感性认识是观察事物所形成的直观的、表面的感觉和印象，而理性认识则是在感性认识的基础上，经过深入思考而形成的比较全面、比较深刻的认识。一般说来，只要一种精神活动达到自觉地认识某种事物的程度，无论其结果是感性认识，还是理性认识，都属于广义的思想范畴。在思想史研究中，人们所能直接面对的是一些历史上的思想现象的结果，有的保存了一定篇幅的文本，更多的则仅是片段言论。这些思想结果的形成过程大多需要依据间接的实证材料求索。在这个意义上，作为思想史研究实体对象的“思想”，特指在一定历史背景下人类认识过程的结果，包括形成的观点、提出的主张、表达的观念、论证的学说等。

学者们通常将思想史的研究对象设定为层次较高的思想成果。一些学者将研究对象限定在理论、学说层面，有的甚至主张思想史的研究对象仅限于思想家的思想。笔者认为，每一位研究者都可以为自己设定一个“思想”定义，以便形成对象明确、逻辑自足的思考与阐释。无论出于学术旨趣、问题设定，还是基于学科分化、学术分工，这类做法都无可厚非。但是，如果试图用任何一种相对狭隘的定义框定学科领域，乃至自设畛域，就会导致许多问题。因此，无论怎样设定具体对象，一个思想史研究者都应当将各种广义的思想现象收入眼底。主要理据有以下三点。

首先，感性认识是认识的根源和基础。理性认识之所以靠得住，正是由于它来源于感性认识。因此，即使旨在解读一种理论、学说，也必须考察其根源和基础。以孟子政治学说研究为例，许多学者夸大“民贵君轻”之论的特异性，甚至断言这是“异端”、“野花”、“绝唱”、“无人企及”，乃至“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然而，只要认真地翻检一下历史文献，就不难发现：民众重于君主的观念发端甚早，源远流长。它来自对政治现象和执政规律的深刻认识，其基本思路获得广泛认同，乃至成为华夏先民的政治常识。孟子既不是最初的创意者，也不是最佳的阐发者。他更像是一种影响广泛的思潮的代言人，其贡献在于用精彩的话语阐释了群体性的政治认知。由此可见，如果不广泛地考察相关思想材料，便轻易判定孟子政治学说的本质属性与历史价值，就难免招致失实、浅陋之讥。

其次，思想家的一些“理论”未必不是感性认识。以孟子的性善论为例，它

是思想史、哲学史的研究对象，也确实具备“理论”乃至“哲学”的形式。但是，这类貌似抽象的“理论”实际上并没有达到理性认识的程度。且不说孔子、荀子、董仲舒、扬雄、孔颖达、韩愈等历代名儒都不赞成简单化的人性本善论，就连张载、朱熹等著名理学家也明确指出孟子的见解是不恰当的。从对客观事物的认识程度看，孟子的人性论是相当肤浅的。如果用“全面的”、“本质的”和“内部联系的”这类词来界定理性认识，用“片面的”、“现象的”和“外部联系的”这类词来界定感性认识，那么孟子的人性论只能归属于后者。此类事例不胜枚举。

最后，社会大众的“感知”未必不是理性认识。历史上的社会大众思想成果很难被保存下来，保存下来的也大多是一些片段。但是，不能据此便断言社会大众的思想统属于层次不高的感性认识。常识告诉我们：不仅每一个心智正常的人都有分析、综合、推理、判断的能力，而且每一个时代都会涌现为数众多的具备理论思辨能力的人。换言之，心智正常的人有能力创造较高层次的思想成果。历史文献保存下来的许多民谚、歌谣、警句、口号具有深刻的思想性乃至哲理性，这便是明证。这类思想成果大多仅留下只言片语，却相当精彩，其中一些足以展示深刻的思考、时代的诉求和普遍的价值，属于一种相对稳定或固化的思想。实际上，这类思想成果的创造者大多具备思想家的素质，这类思想成果的形成也经历了理性思维的过程。笔者主张，思想史研究者必须将这类思想现象纳入自己的视野。

顾名思义，“政治思想”即有关政治的思想。依据系统化的程度，研究者所能观察到的历史上的政治思想成果大体可以分为三个层次，即普通人的政治观点、政论家的政治主张和思想家的政治学说。被文献保存下来的普通人的政治观点大多比较零散，许多观点具有自发性或直接感受性。但是，这类记载是研究政治文化和大众心态的重要事实依据。政论家的政治主张通常以政论文章的形式被保留下来，这类主张是一种在分析、综合、推理、判断的基础上形成的思想成果，因而大多比较系统、比较深刻。思想家的政治学说则是体系化乃至哲理化的思想成果。政治学说是思辨的产物，有独创见解并能自成体系，大多比较完整。一种政治学说一旦为人们所接受，就会对他们的心理、观点、主张、取向有重大的影响，进而支配他们的政治行为。占统治地位的政治学说是一定政治体系的重要构成之一。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的核心，它不仅直接表现为理论形态，以体现统治意志，还贯彻到国家政治制度和政策法规中，以维护现存秩序，并积极干预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为人们的行为提供基本准则和规范，进而支配、影响其他各

种社会意识。

从发生过程看，零散的观点、系统的主张、完整的学说三者构成递进的关系，有一个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进而理论化、体系化乃至哲理化的演化过程。因此，依据个体思考所达到的高度，可以将人群大体区分为有所感知的普通人、颇有见地的政论家和见解独到的思想家三大类别。从互动过程看，政治观点、政治主张、政治学说三者交互作用，并无天壤之别。社会大众的政治观点既是系统的政治主张和完整的政治学说的源泉，又往往是受到一种政治主张或政治学说影响的产物。在现实生活中，心智正常的人都有能力对其所感知的政治现象进行分析、综合、推理、判断，大多还能从不同途径获得比较完整的政治知识，因而普通人的政治观点通常都有理性认识的支撑，群体性的政治观点大多与某种政治主张、政治学说有千丝万缕的关系。这就是说，普通人的政治观点往往包含理性的成分，具有思想的属性。实际上，普通人、政论家、思想家的界限也只是大体而言。一些只留下只言片语的“普通人”可能原本应当被划入“政论家”乃至“思想家”的范围。他们之所以被研究者忽略或割舍，只是因为其系统的阐释没有留存下来而已。不能简单地将社会大众的政治观点统统归于低层次的思想成果。因此，只要一种观点被记录在案，就应当纳入思想史的研究对象。其中保存相对完整、经过推理判断的观点、理论、学说是思想史研究的重点对象。

是否可以将大众思想列为思想史的研究对象？学界多有争论。笔者的观点是：就学术分工而言，剖析具有一定理论色彩的思想现象是思想史研究的主要任务。以思想家为主要线索之所以成为传统套路，其根本原因就在于这是思想史研究的主体部分。但是，思想并非仅仅演绎于精英的头脑。大众思想并非总是滞后的、被给予的，也不仅仅是经典思想、精英思想的背景和陪衬。思想家的思想并非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即使认识高度哲理化的思想的形成原因和演化过程，也必须面对一切曾经发生过的人类心智现象，其中全面、深入地研究大众思想尤为重要。因此，系统的思想史研究必须将大众思想摆在重要位置。

思想多从大众出，哲学寓于常识中。只要看一看我们所身处其中的普通人群的思想状况，就不难感知在社会大众中蕴藏着多么丰富的智慧，他们提出的一些真知灼见未必比思想家们的逊色，经他们升华的一些生活哲理甚至比哲学家们的更高明。实际上，社会大众并不缺少“反思思想”的思想，更不缺乏“思想思想”的能力。包括一些哲理性思维在内的精神财富，大多是由社会大众所首创的，他们的精神世界也不仅仅是一种“平均值”。主流思想必须由庞大的群体承载，许多思潮也并非由精英发端首倡。离开了群体性精神求索的启示与养育，思

想就会成为无源之水。离开了社会普遍意识的有力支撑，精英思想往往会显得苍白无色。就像江河湖海一样，大众思想是庞大的水体，社会思潮是涌动的波涛，而精英思想是泛起的浪花。浮于表面的浪花最为引人注目，也容易被抓拍到，所以观察者们首先盯住了它们，还极易形成波涛由浪花引领、水体由波涛带动的错觉。丰富多彩的浪花展示了水体的主要信息，所以研究它们可以回答许多重要问题。但是，如果因此而忽略了对波涛与水体本身的深入考察，往往会导出皮毛之论。

大量事实表明，用“精英”与“大众”来界定思想层次并不具有可靠性。一些出自普通人的政论往往比某些思想家的玄谈、政论家的说教更切实、更到位、更精辟。大众思想的某些内容可以达到很高的理论层次，甚至应当成为哲学研究的重要对象。这类事例不胜枚举。因此，在充分肯定思想家的独特贡献的同时，切忌低估普通群众的认知能力、思考能力和创造能力，更不能因为历史记载的疏略而将其弃置一旁。

在思想史研究领域，将社会的普遍精神状况作为重要研究对象的历史已经有两三百年的历史了。自意大利学者维科（1668—1744）运用丰富的历史素材研究各民族的“共同意识”以来，中外许多著名学者为我们树立了典范。黑格尔重视考察整个民族的一般世界观，罗素把哲学家视为社会所共有的思想与感情的产物，马克思和恩格斯注重探讨具有普遍形式的思想，他们都是这类研究的先驱者和典型代表。中国思想史研究也有这个优良传统。许多学术前辈注重对各个层面的精神现象及相关社会现象进行整体性观照和综合性解释。侯外庐等主编的《中国思想通史》、任继愈主编的《中国哲学发展史》都是典型代表。

但是，从研究现状看，大众思想、共同价值、普遍意识视角的中国思想史研究依然相当薄弱，主要表现为由于学术思路、认识能力和历史资料的局限，现有成果缺乏应有的广度与深度。因此，必须充分认识思想现象的弥散性和思想载体的多样性，大力拓展、深化这方面的研究。

二、“政治”与政治现象的弥散性

“政治思想史研究”是政治现象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政治”却是一个歧义众多的概念。古今中外的学者给这个词下的定义很多，诸如国家事务说、公共权力说、权力关系说、管理众人之事说、政府制定政策的过程说、价值物的权威性分配说、统治术说，等等。实际上，就连究竟什么是“国家”、“权力”，学术界也没有一致的意见，各种说法差异很大，每一种定义都会给出不同

的领域范围和研究视角。

什么是“政治”？人们可以清晰地感知它的存在，但又很难准确地界定它。于是一些思想深刻的理论家试图通过对一系列关系的综合考察来多层次、多角度地揭示这个概念的主要内涵。这是颇有道理的。

大体说来，政治是围绕国家政权问题而发生的一系列特殊的社会现象的总称。政治是历史范畴，政治现象与国家相伴生，又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改变其内容及活动的形式和范围。政治与国家、政权、统治、公共权力、社会管理、政府、法制、法律、社会秩序等现象及与此有关的各种现象直接相关联。政治的基本内容是参与国家事务，对国家活动进行指导，确立国家活动的方式、任务和内容。政治活动是利益，特别是经济利益的重要表现形式。一切集团或个人参与政治的根本目的都是力图通过掌握或分享国家权力，参与或影响政府决策，以维护自己及相关社会群体的切身利益。各个阶级、阶层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它们之间的政治关系，都要通过国家结构表现出来。政治又是各种重大的社会关系及社会矛盾的集中体现。在一个既定的国家体制和社会秩序中，政治关系在各种社会关系中居于中心地位，它影响、制约甚至支配其他各种社会关系。社会优势群体，特别是在经济上处于支配地位的社会群体，通常也是国家统治权力的真正拥有者、掌握者。这就是说，国家是政治现象的基本形式。各种政治现象都围绕国家政权这个中心展开。政治思想本身就是一种极其重要的政治现象，国家问题必然成为历史上各种政治思想所关注的重点。政治学说亦即国家学说。因此，政治思想史的研究重点也应随之确定。

但是，国家问题不能包纳所有的政治现象。社会是一个有机体，因而政治是一种极其复杂的社会现象。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又在上层建筑领域居于主导地位，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政治是上层建筑中最活跃、最敏感的部分，制约并渗透到哲学、宗教、道德、文学、艺术等上层建筑的各个部分。政治的活动范围极其广泛，几乎无所不及。它往往主动参与乃至以强制性规范干预各种重要的社会生活。人类的各种社会活动都可能自觉或不自觉地与政治发生关系。因此，各种社会现象与政治息息相关，有的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转化为政治现象。例如，“政教合一”、“神道设教”既是一种宗教现象，又是一种政治现象。战争是政治斗争的最高形式。在祭祀和征伐被视为国家头等大事的时代，宗教与战争就是最大的政治。孝道本属家庭伦理范畴，而在统治者“以孝治天下”的时候，道德规范便直接转化为强制性的政治规范和法律规范。当人们以“天”、“自然”、“道”、“阴阳”、“气”之类的概念来论证社会公共权威、政治关系及其规范之时，

哲学思想就是政治思想。军事、法律、财政、外交等都属于与国家政权直接相关的政治范畴。这方面的事例还有很多。实际上，就连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划分也只在相对意义上成立，它们之间并没有截然相分的界限。以探究政治的特性、本质和规律为己任的政治思想家必然将各种相关社会现象纳入自己的视野，进而提出系统的解释和全面的论证。政治现象及相关的思想现象具有弥散性。这就要求政治思想史研究的对象设定和取材范围应该与之相应。

就总体成果而言，中国古代政治思想正是以国家政权问题为中心，兼及各种政治现象，提出系统政治主张的。长期居于主流地位的儒家政论是典型例证。儒家是以“礼”来概括自己的政治学说的。礼的核心问题是社会结构、国家政体及相应的社会政治规范。儒家总是以天道、人性、伦理来阐释王道、王制、王政、王者，论证宗法制度、等级制度和君主制度的绝对性，然后以此为前提，进而讨论礼治仁政等治国之道及礼乐刑政等施政手段。儒家的政治学说几乎涵盖中国古代一切政治现象。其他学派的政治学说大多有与此相类似的特点。

中国古代思想史实际上是一部政治思想形成与演化的历史。自先秦以来，政治问题就是诸子百家共同关注的核心问题，他们都将社会与政治统一在一起来思索，同一个哲理性命题大多兼顾自然、社会、人生的方方面面。因此，重大思想流派及历代著名思想家的思想体系总是围绕政治问题展开，几乎找不到“纯哲学”、“纯经济”、“纯伦理”、“纯文学”的踪影。“大一统”、“三纲五常”等命题的贯通性便是典型例证。“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政教合一”的宗教思想、“内圣外王”的道德思想、“以农为本”的经济思想、“家国一体”的社会思想、“兵为王之本”的军事思想、“圣人王者立法”的法律思想、“文以载道”的文学思想等，有的原本就是政治命题，有的主要是政治思想，有的与政治思想息息相关。这些思想现象既可以划归其他思想史的研究领域，也可以划归政治思想史的研究领域。

政治现象的弥散性与思想现象的弥散性是结合在一起的。这就注定了人们很难为“政治思想”树立公认的界标，划定独占的领地。无论如何定义“思想”与“政治”，都会留下广袤的有争议的边缘地带。这就决定了政治思想史研究必须面对一个范围广阔的领域。因此，政治思想史研究者应当有宽广的学术视野，其取材范围、观察视角、研究方法等，必须超越各种相对狭隘的“政治”定义与“思想”定义的局限。

作为一种专门化的研究，政治思想史研究应当强化政治学视角的分析，这是不言而喻的。但是，无论古今中外，政治现象、经济现象、社会现象和文化现象

总是同寓一体、血肉相连，或彼此渗透，或相互依托，或互为因果，或亦此亦彼。因此，政治思想研究必须有凌驾于众多学科的学术观照。如果没有哲学、社会学、法学、经济学、文化学、伦理学等其他视角的介入，其研究结果充其量只能反映“政治思想”这头大象的胴体。学科分化是一种现代学术现象。专门化分工的客观需要是导致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分科旨在分工，分工旨在合作。不同学科会形成特定的对象、视角、方法、范式，这就产生了学科独立性的问题。一旦学科独立性被放大到不合理的地步，原本积极的学科分工也就极易演化成消极的盲人摸象。在现有学术著述中这种片面性可谓司空见惯。

大量事实提示我们：中国古代政治思想不仅内涵丰富，包罗万象，而且与其他领域的观念、理论、学说紧密交织在一起。因此，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研究不能过分强调专门化，更不应画地为牢。在确定对象、内容及取材的范围时，研究者应当宁失之于宽，勿失之于狭。

三、“历史”研究是一种问题研究

“政治思想史研究”是历史现象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历者，过也；史者，事也。“历史”的本义是指人类社会曾经发生过的事情，涵盖形形色色的“历史现象”，亦即研究者所面对的“历史事实”。历史研究的对象是人类社会过去的事情及其演化历程，亦可称之为“人类社会过去时”，而“人类社会过去时”显然是一个包罗万象的概念。因此，无论作为一个客观对象，还是作为一种学术领域，“历史”都是一个覆盖一切学科领域的概念。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早就指出：“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①这是颇有道理的。

作为学科名目，“历史”学科是现代学科体系中诸多“一级学科”之一；而作为研究对象，任何“历史”现象都不能毫无争议地专属于某一学科。原因很简单：在历史上和现实中，根本找不到具有单纯学科属性的社会实体和历史现象。兹举若干与“政治”和“思想”密切相关的例证。

依据学科分工，学者们通常将各种社会现象分别划归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诸如将国家归属政治、将家庭归属社会之类。但是，在现实生活中，根本找不到属于纯政治、纯经济、纯社会、纯文化的社会实体。以我们每一个人为例，就公民、党派、政见等因素而言，我们是“政治”现象；就劳动、消费、投资等行为而言，我们是“经济”现象；就父母、子女、长幼等角色而言，我们是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1卷，66页，脚注②，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社会”现象；就语言、风俗、习惯等特征而言，我们是“文化”现象……任何一个学科都可以把每一个人作为研究对象，而任何一个学科都无法全面地解释“我”这样一种极其复杂的社会实体。实际上，大到国家、朝廷等政治组织，中到宗族、家庭等社会组织，小到君主、臣民等个体角色，所有的社会实体无不具有上述特征。这就是说，不仅通常被归属政治的社会实体都具有经济、社会、文化属性，而且许多通常被归属经济、社会、文化的社会实体也都具有政治属性。因此，政治思想史研究者必须充分注意各种社会实体的本然状态，并给予必要的学术观照。

例如，家庭是主要以亲子血缘关系组成的共有财产的亲属集团，通常被视为一种“社会”现象。但是，家庭也是一种重要的“政治”现象。这一特征在古代社会尤为明显。在中国古代，以宗法关系构成并维系的家庭是最基本的社会单位、经济单位和政治单位。以“户”的形式存在的家庭组织是一个基本的生产单位，在财产上成为权利和义务的主体。家长与家庭其他成员、夫与妻、亲与子、长与幼、男性家庭成员与女性家庭成员及主人与奴婢之间有明确的尊卑等级关系。父家长对其他家庭成员拥有统治权，甚至有生杀予夺的支配权。在法律上，父家长在家庭中的统治地位及其支配子女的各种特权受到保护，户同国家及他人发生赋税、债务、买卖、不动产处置等方面经济往来关系只能由家长做主。“族”、“户”还被依法赋予连带刑事责任。具有这种属性的家庭的基本等级结构是其他重要的社会等级结构的根源，其统治模式是国家统治模式的缩影，其伦理道德理念是其他社会道德和政治道德的基础。在这种历史条件下，家族、家庭制度也是政治体系的重要构成之一。“家国一体”、“君父一体”、“忠孝一体”观念之所以根深蒂固，纲常伦理之所以成为主流政治文化的基干，儒家学说之所以成为统治思想，就是这种社会现实在政治思想领域的反映。因此，全面审视这类社会实体及历史现象是政治思想史研究的重要工作之一。

依据学科分工，学者们通常将哲学史、思想史、学术史、文化史等视为独立的学科领域。但是，在现实生活中，抽象的哲理、理性的思路、精深的学术、感性的心态，彼此血肉相连，无法分割。为了专门化研究的方便，学者们可以将不同形态的精神现象人为地分割为哲学、思想、学术、文化等，然而，哲学又何尝不是思想、学术、文化？思想又何尝不是哲学、学术、文化？何曾有过一种思想、学术没有哲学的、文化的依托？又何曾有过一种哲学、文化没有经过思想、学术的锤炼？只要大体翻一翻哲学史、思想史、学术史、文化史的研究成果，就不难发现这样的现象：学者们都强调各自研究范围、对象与方法的区别，而他们